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韦伯论大学 / (德) 韦伯著 (英) 希尔斯编; 孙传钊译.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3

(现代思想译丛)

ISBN 7-214-04100-6

I. 韦... II. ①希... ②孙... III. 韦伯, M. (1864~1920)—哲学思想—文集 IV. B516.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7175 号

中译本根据以下版本译出:

**Max Weber On Universities.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nd the Dignity of the Academic Calling in Imperial German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73) Translated,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ory Note by Edward Shils

- 书 名 韦伯论大学  
著 者 [德] 马克斯·韦伯  
译 者 孙传钊  
责任编辑 刘沁秋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金坛古籍印刷厂  
开 本 880×1240 1/32  
印 张 5.625 插页 2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100-6/B·123  
定 价 13.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译者说明

本书是韦伯的论文集,汇集的主要是当年他在《法兰克福报》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涉及韦伯自身参与的贝恩哈德事件、米歇尔斯事件争论、在德国大学教师会议上的言论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和“以学术为志业”两篇文章中的相关部分。从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可以了解韦伯在世纪交替的年代——德国大学的体制发生深刻变化的年代,对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的观点和捍卫学术自由的勇气和责任感;也可以看到他对大工业生产带来的对德国传统大学体制冲击所持的矛盾心态:既为教育行政体制的日益官僚化,即政府对大学教师职位人事权的干涉导致学术自由的丧失深为忧虑,又不满传统的学术圈内行会性的教授自治,看到美国大学的体制更具有活力,更能促进学者之间的竞争。全书的内容大致按照年代顺序,又围绕中心议题来排列。考虑到不少非教育学科、非社会学专业的读者都对中国的大学改革、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等热门议题很关心,为了使读者能更明了地读懂本书,作为附录 1,收录了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上山安敏先生(现已退休)等编译的日文版《韦伯的

大学论》(木铎社, 1979年)\*所收的韦伯在第三届大学教师会议前后的言论(希尔斯编评的《韦伯论大学》中未收);将上山安敏为他们编译的日文版《韦伯的<sup>1</sup>大学论》写的解说作为附录2放在本书的最后。这篇解说深入浅出,译者在此不再对本书做简单的介绍了。

因为此书依据英译本翻译,而且,以前韦伯著作的中文译本中许多词语的译法未臻统一,所以,这里对本书中频繁出现的汉译词语,译者根据德文的原词,结合已经出版的其他汉译韦伯著作的惯例处理,特作以下说明:

1. 德语中的 *beruf* 一词,关于它的词义韦伯本人曾经有过详细阐述。\*\* 韩水法主张译成“天职”;冯克利也曾经在译注中讨论过此词的含义与译法;台湾的译者钱永祥等译成“志业”\*\*\*,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那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授权的韦伯著作的中译本之后,国内学界关于韦伯的研究文章似乎用“志业”居多,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本书采用“志业”,但是,考虑到冯克利翻译的书名\*\*\*\*已经为国人接受,故将第十四部分译成:“以学术为

---

\* 上山安敏等编译的日文版《韦伯的<sup>1</sup>大学论》(《ウェーバーの大学论》)大致也按照希尔斯编译的《<sup>2</sup>马克思·韦伯论大学》编排,但是,书中所收的文章不仅是从德文原著译出,而且增加了日本学者收集的第三届德国大学教师会议继续讨论两周前社会学学会会议上争论的“价值中立”问题时韦伯的言论。这样,从第一到第四届德国大学教师会议上的韦伯关于大学的论述的第一手材料就更加完整了。上山安敏还在每一章的开头,就各个事件的背景,写了希尔斯编译的《韦伯论大学》中没有的详细的题解,在文末补充了大量便于读者理解背景的详细的注释。(本书的页下注均为译者所注。章后注为英文版原注。——中文编者注)

\*\* 参见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58. 汉译见《韦伯文集》所收“路德的(职业)概念”(韩水法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第288—307页)。

\*\*\* 《韦伯文集》,第12页。《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50—51页。

\*\*\*\* *beruf* 一词在《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钱永祥、顾忠华等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被译成“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冯克利译成“以学术为业”。

志业”。

2 德语中的 Wertfreiheit 韩水法主张翻译成“价值不涉”<sup>\*</sup>，本书仍旧依照国内学人的约定俗成，翻译成人们容易接受的“价值中立”。

3 本书第四、第五部分论述的内容的主题词英文为“academic freedom”，一般译为“学术自由”，上述日文版中，日本学者却从“academic freedom of the University”的整体考虑翻译成“教职的自由”，细读韦伯论述的内容，我们知道他谈到的“academic freedom”，即大学教员的言论、思想的自由不仅涉及大学内部的教学与研究活动，也关系到他的社会公共政治生活或宗教活动中的言论和信仰，所以，日本学者的译法也有一定道理，希望读者在读本书的时候，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本书依然根据中国读者的习惯，译成“学术自由”。

4 德国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大学有两类：综合性大学和单科大学。在德文中，前者是 universität；后者为 hochschule。综合性大学出现于中世纪，单科大学是 19 世纪近代化后的产物。译者在翻译本书时，有时为了表示综合性大学与单科大学的区别，将 universität 译成“综合性大学”。而书中的第九部分“The Schools of Economics”也是 19 世纪的产物，实质是高于 Schule（高中）的单科大学，相当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学院（college），因为德国这类学校的培养目标都为商科实用人才，所以，本书根据实际状态翻译成“商学院”，而不译成“经济学院”。

5 德文中“Politik”有“政治”和“政策”两种释义，本书翻译的时候，酌情处理。

\* 韩水法编《韦伯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第 16—18 页。

书中第十三部分“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中立’的意义”<sup>\*</sup>和第十四部分“以学术为志业”两部分国内都已经有了中文译本，考虑全书的完整，不予删略，根据爱德华·希尔斯英文版的译文，也参照国内学界译文译出。能借鉴这些成果，在此也对这些翻译韦伯著作的先行者表示致谢。

此书的序、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二部分是由惠圣先生译出初稿，我在翻译其余部分的同时，对这些部分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正、校对，有些地方重新翻译，最后进行文字上的统一，所以，文责当在笔者。

在与上山安敏先生联系关于该解说等译文版权的问题的时候，上山先生很快回信，一口允诺，借此机会表示由衷感谢！

最后，向很快对我提出此选题做出积极回应的江苏人民出版社表示感谢！

孙传钊

2005年 10月

---

<sup>\*</sup> 《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36—182页。

# 目 录

译者说明	1
序	1
1 贝恩哈德事件	1
2 关于“贝恩哈德事件”的一个补充说明	9
3 贝恩哈德事件和德尔布吕克教授	11
4 德国大学的所谓的“学术自由”	21
5 大学的学术自由	28
6 美国的大学与德国的大学	37
对马克斯·韦伯的答复	45
7 马克斯·韦伯论“阿尔特霍夫体制”	49
对马克斯·韦伯的第二次答复	53
8 马克斯·韦伯与阿尔特霍夫体制	56
9 商学院	59
10 关于在德累斯顿的发言的补充说明	65
11 再论“阿尔特霍夫体制”	73
12 萨尔茨堡的天主教大学	77

13 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中立”的意义	79
14 以学术为志业	90
附录 1 在第三届德国大学教师会议上的发言	103
附录 2 关于《韦伯的大学论》——代解说	111
译者后记	164

## 序

韦伯生于 1864 年，卒于 1920 年。早年致力于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与法律史研究。其学术生涯始于柏林大学，时任教授法律的编外教师 (Privatdozent)。1893 年，他成为弗赖堡大学经济学教授；1896 年，作为经济学教授被邀请到海德堡大学接替克尼斯 (Karl Knies) 的职位。1903 年因病离开讲坛，直到 1918 年才重新执教。这期间他尽管疾病缠身，业绩依然迭起，研究领域包括西方和亚洲宗教史，社会、经济、法律史，并对产业工人阶级做了大量调查。他于 1904 年担任《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主编，该杂志在 1933 年停刊之前一直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社会科学期刊之一。此外，他还写了大量时政文章，一战期间，他更成为政治领域的活跃人物。虽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强烈反对君主制及领土扩张计划。

离开讲坛期间，韦伯仍住在海德堡，并在当地异常丰富的精神生活领域发挥了核心作用。其间，韦伯著述丰硕，如：《宗教社会学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2nd edn, 3 vols,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22–23)；《科学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22); 《经济与社会团体》(*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2 vols,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22); 《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24)和《社会学与经济史》(*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24)。他正是以此成为社会科学历史中的伟人。他学识渊博,其分析之透彻和广度也不在其学识之下,尽管其学术涉及上古的以色列、中国、印度、罗马以及宗教改革诸领域,但他还是更多地对西方现代社会特征、起源和命运给予了极大关注。他虽然非常钦佩俾斯麦的政治才华和成就,但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把俾斯麦视为德国政治不振的根源。他认为,俾斯麦那种长期的耍手腕的统治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不仅毁坏了已有文明,而且不容许任何新的文明诞生。德国民众面对政客的花招以及强大的官僚机构,由于缺乏自尊和责任感,显示出毫无独立的倾向和能力。考察当时的德国大学的时候,韦伯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他认为,在德国,学术人失去了作为学者的尊严感。如同政治领域一样,他们被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f)这样的大权在握的强人所愚弄,学术在引诱、欺骗、蛊惑中走向腐败。韦伯认为德国大学的教授们在自欺欺人,他们幻想学术自由依然会存在于那个充满重重束缚的领域,对皇帝和政客们墨守成规的做法,教授们由于追逐名誉、屈从专制、趋炎附势而浑然不觉。

韦伯没有预见他去世之后挣扎于困境中的德国教授们的行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致力于其未竟的著作,关注德国战败后失调的公共生活,虽然重新登上讲坛(1918年在维也纳,1919年在慕尼黑),但未曾再度提及其早年文章中涉及大学和国家的主题。然而,在他身故后,如此多的德国学者对纳粹当局的屈从,似

乎可被看做当年韦伯做出关于德国学术界对政要卑躬屈膝、品行堕落的判断的确实证据。

韦伯关于政治和官僚权威下德国大学问题的著述,当年为《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刊出,这些著述和他的另外四篇即兴的短论一直未被重印或收集<sup>1</sup>,也未被翻译过。后来它们被汇集和翻译后,刊载在《智慧女神》(*Minerva*)上,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当代伟大智者稀有的著述,更是因为他处在一个特殊背景和矛盾状况下,强调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等自由主义观念的一些基本原则。韦伯写于60多年前的这些简短的文章中所体现的原则,值得《智慧女神》的读者们关注和深思。

除这些偶然的即兴论战外,韦伯还在其他一些著作中论及大学问题。1917年,他发表了一篇长文\*,论及价值评价或判断与经验性知识或真实性知识之间的关系。经多年努力,他要让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他们对具体政策的建议,不单出自于经济学研究,而是基于他们希望别人能够接受的建立在某种道德和政治基础之上的观念。在这篇文章的前言中,他论述了大学里社会科学教师是否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展示自己的政治道德和政治价值观,以及在什么条件和形式下,他们这样做才是合理的等诸多问题。我重述这篇文章的相关部分,是因为它表达了韦伯的如下观点:大学教师如果要表达其所承认的权威和应该实施的政策的想法,那么,他应当承担起去这样践行的责任,而不应只是把它作为基于“事实”的“假设”,而自己却置道德责任于不顾。

1919年,他向慕尼黑大学学生联合会做了一场关于《以学术为志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演讲,这是他在痛惜科学和学术局限的同时,对科学价值信仰的一次最深刻、最动人的告白。演讲

\* 即《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中立”的意义》。

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学术生涯的危险性,这引发了人们对求知原因的讨论。我之所以再次收录刊载在《智慧女神》上的有关《以学术为志业》中的部分内容,是因为那部分内容补充了他在论述时政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个体责任感和团体自尊感是学术繁荣和大学正常运作及其社会功能发挥作用的前提和条件。

爱德华·希尔斯

## 注 释

---

<sup>1</sup>慕尼黑的马克斯·韦伯研究所的温克尔曼教授(Johannes Winkelmann)向我提供了珍贵的原件的复印件。

# 1 贝恩哈德事件<sup>1\*</sup>

新闻媒体刊载了许多讨论“贝恩哈德 (Ludwig Bemhard)事件”的文章,还是不能满足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关心。丑闻在于政府——或更准确地说首先是部长个人——把一位教授强行安排在德国规模最大的大学,而受影响的该领域的学者们,他们算得上德国最受尊敬的学者,从新闻媒体那里或拜访了他们的这位新同事后,才了解这一情况。但是,这对其他某些方面的影响也许更为重大。首先是此人被突然任命的举措。当这些领域的学者们——像现在的贝恩哈德先生一样年轻的时候,任何一个被部长聘请,接受一个被确定的教授之职的人,在他自己决定接受职位之前,他应该拥有作为大学教员的智力上的信心,或至少得到这一领域中最杰出的同行的信赖,愿意与他共事,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正当的学术要求之一。不管他是否理解这些条件将导致他在获得这一职位方面会遇到许多困难,即使这些只是道德方面的要求,他也应做到这一点。有人因为“市场形势”对他们“有利”,为了在学术

---

\* 见本书第二部分“关于‘贝恩哈德事件’的一个补充说明”的注2。当时,人们传闻哈纳克是“贝恩哈德”事件的主角。

领域“出人头地”，竟然破坏这些不言而喻的规则。这种为了达到个人职业上晋升的目的，竟然趁机捞取因为宗教上或政治上的原因强加给大学的“惩罚教授”<sup>\*</sup>之职的人，会受到相应的评判，而且，也会受到其同事相应的对待。

一旦我们注意到这一事实，即贝恩哈德先生认为无需关注这些规则，那么，对于他个人，我们也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然而，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态度正明显地在某些领域的新一代学者中，变得越来越普遍。同样重要的是，普鲁士政府正在鼓励这种“投机者”，因为这种人是学术禁锢所需的。当今，为这种类型的人提供作为谋生手段的教授席位会变得越来越被认为是正常的。

至于柏林大学本身，赋予一个教授职位，自然被认为是财政上有利的东西。然而，这被视为伟大的科学家或学者荣誉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确实，我们有幸看到，即使在今天的柏林，仍有许多人既是许多领域中科学和学术界的带头人，同时也是具有完全独立人格的人物。但是，出于盲从而极力追求教授职位的平庸投机者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显然，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增加得更快。现在贝恩哈德先生这种类型的人出现了，从政府的观点看，对大学教授职位<sup>\*\*</sup>的任命，本质上是一个赠予其金钱利益和社会声誉的赞

---

\* 当时普鲁士政府见到不顺眼的学者占据了教授职位的时候，就任命一位迎合政府政策的人当教授，通过这样的任命来使得他们相互对立，消除前者的影响力，具有对前者惩罚的意味。所以，当时韦伯等把后者取得的职位叫做“惩罚教授”。这种做法最早出现在神学院，比如为了平衡天主教与新教两派之间、或新教内部正统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教授职位的人事安排所做的任命。到20世纪初，政府根据财界的意向来任命教授又成了普遍的现象，所以，出现了政府控制任命权，限制讲坛社会主义学者独占讲座制教授职位的措施。所以韦伯说：“……因为宗教上或政治上的原因强加给大学的‘惩罚教授’之职……”

\*\* 指讲座制教授席位。

助行为。

作为这种现状的一个结果，地方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大量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会留在看重科学和学者标准的州里，而不去柏林接受被任命的教授职位。自然，从柏林大学的立场来看，这些事情一定会得到不同的评判。滑稽的是：在学生人数增加的同时，柏林大学的一些学院正在试图努力限制教授职位的数量，这种努力，部分学院取得成功，部分则不成功；同时，已经有一所学院提出一条规则，要限制其他大学的教师进入柏林大学，并且已经尝试以此限制为手段，避免一位公认杰出的学者成为那里的编外讲师；这种做法，已经和专家们的观点发生冲突。<sup>2</sup> 具有独特讽刺意味的是，当一位部长认为需要一个能干的年轻人接手关于某些政治意图方面研究的时候，已经发生类似事件的这所大学，现在都欣然允许将它的教授职位用做接受政府赞助的这一目的。<sup>3</sup>

如果对这种聘用教员时的非学术目的做出让步，特别是偏离应该尽可能任命学术杰出的人这一基本原则的话，那么，最终会导致大学的道德权威的削弱。自然，这样做的结果，不一定都像我们现在面对的那个事例那样昭然若揭。尽管他在学术上是如何地尚未成熟，贝恩哈德先生已经写出了一本具有一定方法论特色、论据有力的著作，至少对我而言，它是一部给人深刻印象的著作。<sup>\*</sup> 但是，众所周知，有这样的先例：在经济学领域中，希望取得这个职位而在门外窥视的，至少还另有两个具有其他方面的“长处”的人，其中一位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施图姆 (Freiherr von Stumm) 时期”<sup>4</sup>。这种状况迟早必定会朝相反方向逆转。

不可思议的是，就像瓦格纳 (Wagner) 和施莫勒 (Schmoller) 这样的人，竟然也认为将来不会再出现个性独立、学术出众的继任人

\* 《波兰问题》，参见注 3。

了。在普鲁士其他的大学中也是这样。今天他们不必再和阿尔特霍夫先生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打交道,尽管其“体制”弊病百出、问题丛生,他仍然保持了其特有的权威。现在,他们宁可使自己的命运处于可怕、低劣和繁琐的“经营者”亲自出马实施的友好的监护中,也不愿处于那种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为顺从、守法的学术“经营者”创造一个有利的“市场”的人的掌握之中,如经验显示,即使学院里只来了一位平庸的教授,一只老鼠会毁掉一锅汤。将来,所有的大学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像目前的情形一样,特别是柏林大学的教授们,将只会被允许选择卑恭屈膝的形式。也正因为柏林大学的教师们削弱了自己的道德权威,所以,那所大学的成员将无力应对公众舆论和政府压力。由此而来的结果是,未来逐渐充实他们队伍的更多的同事们,将会继承他们的衣钵。

很明显,在柏林大学,像其他地方一样,也有一些具有强硬性格的学者,继承、保持其与高层教育行政当局的相对学术团结与独立的光荣传统。但是,人所共知,这一群体的人数并非在逐渐增加。不幸的是,对柏林的教授们来说,距教育部的大门是如此之近,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这种令人不快的形势一直有不断恶化的趋向,普鲁士的“地方教授”向那些实际上或据说是具有影响力的柏林同事写信诉求和抱怨,希望后者能够在“高层决策者”中为他们说情。个人与教育部关系的这种围绕权力运作——实际上已经在每个领域或多或少地以公开的形式在发展——毫无疑问,这也经常被某些杰出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柏林学者们运用于他们的学术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即使大权掌握在一个不懈地追求学术绩效评估的客观性的人的手里,当一个人控制这么多任命权的时候,仍旧有被他的个人偏爱与兴趣好恶所左右的危险。

然而,今天的情况正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正如“贝恩哈德事

件”所显著表明的：基于这种私人关系基础上的影响力，即使它是由杰出的学者们在“实践的观点”变得日益确定无疑时践行的，结果也只能是靠不住的伪力量。并非仅仅是各种不同的个人影响力彼此抵消——看来，在目前事件中，虽然在专家的监督下，那个著名的神学家的行为，看来并非相当公正——但是，当涉及个性较弱、不那么优秀的人的时候，政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利用他们的虚荣心将不当之事办得相当圆满。柏林大学的“经营者”愈多，事物或许也愈会这样发展，即政府将会在各种有点小麻烦的事情上满足那些教授们的希望；那些教授们为了个人利益，继续保持这种“个人联系”，例如将会为他们的保护对象和类似的人提供推荐书——这样做将会使他们满意。结果，代表“地方教授”利益的柏林教授们的庇护，甚至可以经由非官方机构得以实现。但是，与此同时，由于这一原因，在那些本应该由专家学者和院系决定的重要的事情上，他们实际上已经难以有任何作为。任何习惯于运用他的个人关系以庇护人身份帮助其保护对象的人，抛弃了应该如一个专家和行使官方权力的人那样对其观点负有的道德责任。

上述柏林教授整体发展的方向，看来不会很容易因受到影响而停止下来。对学术职业的群体的团结一致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我们依然记得：柏林人士回应关于所有大学共同关心问题的学术讨论时那傲慢、愤怒的指责和训斥。<sup>5</sup>即使不是进行那种亲切的协商，也没有人能怀疑，一个超越地方性的大学教师组织的影响面，就其本质来说，一开始就有其特定的局限，不管它的基本原则如何。除了讨论大学教学的重要问题之外，拥有英明领导的一个大学教师的组织，仍然能够再度唤醒下一代学者的团体自尊感来弥补“实践的观点”的缺憾，而且，它可以藉此有助于那日益衰退的大学的道德责任感的重建。没有人能

真正怀疑这一点。“贝恩哈德事件”已经显示这两项工作对普鲁士来说是急需的。我也不想在这种场合讨论这种时常使人痛苦和激动的(聘用)方式,正是运用这种方式,普鲁士体制和具有特定影响力的柏林人士,最近已经开始把他们的权力扩展到普鲁士的边界以外。

最后,对未来比较一般的反映一定会显示“实践的观点”的蔓延和教授“互助会”的庇护的成功多么有害。就大学而言,政治生活的氛围和兴趣正在影响政府关于大学的政策。像“贝恩哈德事件”这种事情,以及这一“事件”造成的形势是一个征兆,必然严重影响学生对大学教师的尊敬。这对政府的利益是否长期不变,还是让政府去考虑吧。不管怎么说,五月发生在奥地利大学中的事件是对其德国姊妹学校的一个警告,公众舆论和学生的压力不允许他们丧失原有的道德信用,也不允许他们用他们自己的错误行为摧毁这种信用。

## 注 释

---

1出自“Der Fall Bemhard”, *Frankfurter Zeitung*, 18 June, 1908 (unsigned).

贝恩哈德生于 1875 年,1908 年被普鲁士教育部大学事务部门负责人阿尔特霍夫擅自任命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正教授。这一任命并未与该大学的相关院系进行协商。根据在整个 19 世纪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的惯例,德国大学的教授任命通常是由校方列出简单的候选人名单呈送给政府中负责相关事宜的部长,再由这位部长决定任命哪位候选人。尽管这位部长并无义务非得在这份名单上挑选候选人,但他通常会这样做。

贝恩哈德曾经在波森 (Posen) 的一所学院和格莱弗瓦斯德大学、基尔大学短期任教,之后,就晋升为柏林大学正教授。1907 年,他出版了关于波兰农民进入东普鲁士问题的著作《波兰问题》(Die Polenflucht)。这些波兰移民是指那段时期进入东埃尔贝 (East Elban) 地域的大量季节性农业工人。他们的